

管理的正负效应等。这些都是以往有关论著中较难见到的。

第五，既有严肃的学术性，又有相当的可读性。本书着重于官僚群体角度的透视和动态描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般学术著作的古板面孔和学院色彩，显得比较活泼、生动。因而本书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也会引起社会各界朋友们的兴趣。

史学与文化的双向考察 ——评《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

王 记 录

读完陈其泰先生所著《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感受颇深。这部书无论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对具体问题的结论上，都有新意，是近几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本书的突出特色是，转换视角，从文化角度对中国史学的确立与转变作整体性研究。作者提出：史学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与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联系尤为密切，不可分割。“忽视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更会严重障碍我们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灵魂，捉住书中跳动的时代的脉搏”。“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史学”这一论题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并让历史学对当前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

通观全书，这种视角的转换至少已表现出三项意义：第一，适应了学科发展的需要，使史学史研究走出了单科性的狭隘范围。

在史学史研究的领域里，要籍解题式的格局和学术专史的格局在长时期内一直阻碍着研究的深入。尽管早在六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就撰写文章，试图使这种局限得以克服，但时至今日，史学史的研究依然受到上述两种模式的局限。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也曾指出过：“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别传，那么它将是很有限的学科了。”如何摆脱要籍解题与学术专史的格局，走出“很有限的学科”，展示史学史的丰富内容就成了史学史研究如何深入下去的关键。作者指出，文化史研究在方法上有自身的优点，那就是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等相互间的关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思路，正好弥补以往史学研究的不足”。第二，通过对史学与中国文化的双向考察，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认识。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延续至今的文化，而这种延续所依靠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几千年来连绵不断的历史记载，这种历史记载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作者又从史学的角度分析文化，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生命力，而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正是这种凝聚力与生命力的体现；许多优秀的史家，在自己的史著中都表达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如司马迁、范曄、司马光等；中国史学在演进过程中，对于形成民族文化的朴素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代史学形成了爱国主义传统，对民族自救自强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所进行的归纳，角度新颖，发人深思。对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作者的论述更是精辟，作者认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是由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是时代的剧变，西方进步文化的输入，冲击着中国所固有的史学传统。二是中国文化内部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提供了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

传统史学内部有近代因素的孕育，有继续前进的内在基础与内在动力，如朴素民主思想、变易的历史观、严密科学的考证等。这些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情况下被有识之士发扬光大，并与西方文化相结合。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没有截然的断层。作者对大量资料加以科学分析，驳斥了那种近代文化“移植论”，提出了“转变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具有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第三，能够使我们深入开掘，并使史学更加贴近生活。作者指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可以使我们能够在史学史领域中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使是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史学名著，只要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结合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来考察，就能发现许多一直被掩盖的新价值。书中对《史记》、《汉书》、王鸣盛史学、章学诚史学、崔述史学的研究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记述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通过作史来实现的，并把他所生活时代的价值观念灌注到史著中去，如果从文化走向、社会思潮进行考察，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到让历史学更加贴近生活，无疑是有意义的。

作者还成功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作深刻的阐发，推进了规律性的认识。作者对中国史学确立期与转变期作比较研究，目光敏锐，见识高明。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是剧烈的，将二者贯穿起来研究，不但使我们了解了传统史学向后演变的“流”以及近代史学早先存在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史学产生及其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规律。作者通过对确立期与转变期史学的总括性比较，指出二者在史书撰述形式、时代内涵、史学理论上有所相异之处，同时指出二者在史学思想活跃、重视继承、勇于创新上又有相似之处。再如，作者认为公羊历史哲学本来具有宣扬“大一统”的政治性，三世说的变易性以及微言大义的可比附性，在近代初期，经过有远见、有魄力的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

等人的改造，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在近代史时期有一定的应变力，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经过近代先进人物改造、阐发之后，可以并且能够与西方传入的进步学说相沟通。”

本书的又一特色是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使看似松散的著述形式形成了一个体系。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把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划分为确立期、平缓发展期、转变期三个阶段。书中重点论述中国史学的确立期与转变期。

作者认为中国史学从创始、奠基到确立，分别应以《春秋》《史记》、《汉书》为标志。而这三部史书的先后出现，是与它们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勾划了传统史学从创始到确立的清晰轨迹。作者把转变期的史学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之前，在此阶段，传统史学中孕育着具有近代意义的积极因素。第二阶段，自鸦片战争至本世纪初，近代史学由逐步酝酿到正式产生。由于传统史学中已有近代因素萌芽，具备了迎接西方新文化挑战的能力，因此在近代史开端时期，中国史坛便出现了倡导爱国救亡、忠实记述反侵略战争的史著，同时出现了认识外部世界、结合现实社会而著史的新风气。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便跨入了近代史学的行列，不久，具有完整意义的中国近代史学便产生了。本书论述具体问题也屡出新意。如，以往史学界一直把《汉书》作为封建史学的典型标本加以贬抑。本书作者则从汉代社会思想入手，把《汉书》与它同时代的《论衡》做横向比较，指出其思想的进步性，又把《汉书》与《史记》作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它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揭示出《汉书》在史学上的创新，并进一步发掘出《汉书》在历史考察中体现的实录精神、唯物主义因素、人民性等，从而有力地肯定了《汉书》在史学上的作用与地位，见解独到，令人信服。